

国学大讲堂

【商君书导读】

张觉等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商君书导读】

国学大讲堂

张觉等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商君书导读 / 张觉等著.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9.1

(国学大讲堂)

ISBN 978-7-5078-3013-2

I. 商... II. 张... III. ①商君书-注释 ②商鞅变法
IV. B226.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81028号

商君书导读

著 者	张 觉 等
责任编辑	姚 兰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海军政治部印刷厂
开 本	640 × 940 1/16
字 数	165 千字
印 张	19.5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1 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013-2 / B · 72
定 价	32.00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前 言

近几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讨论和历史评估，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国学”成为流行语。所谓国学，一般认为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深厚的民族土壤孕育出了博大精深东方文化，作为世界三大文化系统之一，中华文化具有独特的价值，它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灵魂。

在六千余年的发展史上，我们的祖先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成就，曾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博大而深邃的国学，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凝聚了先哲们优秀的、具有恒久、普适价值的思想智慧。

明清之际，由于诸多原因，中国社会没能完成适时的转型，逐渐落后于西方。鸦片战争的失败，更使中华面临几千年未有之空前变局，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一直到新文化运动，无数志士仁人为救国于危难，有意无意地把寻找救世良方的目光投向西方，投向西学，传统文化遭到空前的冷落甚至猛烈的批判，连中医中药等物质文化财富也受到牵连。国学几乎成为落后、愚昧的代名词，被指斥为近代衰落与灾难的罪魁祸首。

改革开放以后，中华民族的历史开启了新的一页，民族复兴的伟大潮流势不可挡。但当西风拂面之时，媚外的思潮也暗流涌动。好莱坞大片被热捧，屈原、司马迁蜗居墙隅。莘莘学子们的托福、GRE 高

分令命题者咋舌，而浅显的文言文却译得啼笑皆非。长期以来忽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恶果日益显露。

马克思说，人民创造历史必须“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同样不能抛开传统文化遗产。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有凝聚力。凝聚力的基础是人民具有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根本来源于对民族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的明确认知。

值得欣慰的是，在精深博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资源。生生不已的变易之道，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大丈夫气概，民为邦本的政治哲学，正德、利用、厚生相统一的精神物质兼顾的文明观，等等，都是救治“现代病”的良药，开启今人智慧、滋养今人心灵的营养。

国学不腐更不会朽，它是清新而流动的活水，亘古常青，生机盎然。有鉴于此，我社组织学术界的一流专家，编辑了这套《国学大讲堂》。

本书系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科学等多方面，分册导读，重点在“导”，力求用较短的篇幅，使广大读者对这些元典有较为全面的认识，既能发掘文化瑰宝，又可辨别、扫除障眼的糟粕。

本套丛书的作者，都是学有专长的权威长者，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相信通过他们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阐释，广大读者会有多方面的收获。

由于编辑时间相对仓促，失误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谅解并不吝赐教。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9年1月

目 录

导 言

一、小引	3
二、知人论世	4
(一) 商君所处的时代	4
(二) 商君的生平事迹	10
(三) 对商君的历史评价	21
三、《商君书》的真伪	29
(一) 考辨《商君书》真伪的著作	29
(二) 对《商君书》真伪问题的主要观点	30
(三) 《商君书》各篇真伪考辨	32
(四) 结论	48
四、《商君书》的流传与读法	49
(一) 《商君书》的编集及其书名	49
(二) 《商君书》的散佚及明清版本	51
(三) 现代《商君书》注释本简介	53
(四) 《商君书》读法	54
五、《商君书》的思想内容	60
(一) 商君的国家观念	61

（二）商君的强力观	61
（三）商君的法治思想	63
（四）商君的势治学说	66
（五）商君的排斥异端	69
（六）商君政治思想综述	69
（七）商君的军事思想	69

注 析

例言	75
更法第一	77
垦令第二	85
农战第三	99
去强第四	111
说民第五	122
算地第六	132
开塞第七	146
壹言第八	156
错法第九	162
战法第十	169
立本第十一	173
兵守第十二	176
靳令第十三	181
修权第十四	190
徕民第十五	197
刑约第十六（原文亡）	209

赏刑第十七	210
画策第十八	223
境内第十九	235
弱民第二十	246
御盗第二十一（原文亡）	259
外内第二十二	260
君臣第二十三	264
禁使第二十四	270
慎法第二十五	277
定分第二十六	285
《商君书》佚文六法	296
后记	299

導 言

一、小引

商君（商鞅），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大政治家，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所以，进一步了解一下商君，认真地研读一下《商君书》，无疑是每一个想熟悉与研究中国文化者的要务之一。

读任何一部书，都应该先了解一下它的大概情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较顺利地登堂入室，窥其堂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读一般典籍如此，读《商君书》也同样如此。

首先，我们应该知人论世，知道该书的作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它，真正领会其主旨。所以，我在第二节对此作了介绍。

其次，我们应该了解该书的真伪情况，知道其中哪些篇章是真正的商君之作，哪些篇章是后人的作品，从而正确地利用它。所以，我写了第三节供读者参考。

再次，我们应该了解该书的文本情况，知道它是由谁编定的，在流传过程中是否有散佚，有哪些版本流传于世，我们现在应该找哪些本子来阅读，以便我们清醒地使用它。由于《商君书》是一部古书，对于现代的一般读者来说，必须依靠注释才能读懂它，所以，在第四节中，除了介绍善本外，还特地介绍了现代的各种注本以及《商君书》注本的读法，以便读者更好地利用前人的注释。

最后，我们应该了解一下该书的大体内容，以便我们在总体把握商鞅思想的基础上更好地去把握它各篇的内容。由于《商君书》篇幅不大，所以本书在后面收录了其流传于世的全部内容，并作了详细的注释解析。因此，第五节介绍其思想内容时采取了简略的办法，只介绍其主要内容。读者欲知其详，可细读本书详注的篇章。

二、知人论世

（一）商君所处的时代

从周平王东迁雒邑（在今河南省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历史上称为东周，也称为春秋（前 770 ~ 前 476 年）战国（前 475 ~ 前 221 年）时代。这一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在此之前的西周，实行的是一种封建领主制的贵族政治，这种政治制度的核心便是封建宗法制度，也就是所谓的周礼。在这种制度下，周天子授爵分封诸侯，各级统治者都有固定的世袭名分。整个国家就依靠着这种宗法等级制度维持着。但是，到了东周，西周时期王室独尊、一统天下的局面就完全被打破了，形成了周室衰微、政由方伯的新形势。

这种新形势的形成首先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人们不但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生产经验，而且在生产中广泛地使用了铁器，进一步推广了牛耕，有的诸侯国还兴修了不少水利设施。这一切，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特别是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荀子描述当时的经济情况是：“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荀子·王制篇》）这种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经济关系的变革。封建领主制时代的井田制逐步瓦解，逐渐向封建地主经济的租税制转变。到春秋中后期，齐国的“相地而衰征”（《国语·齐语》），鲁国的“初税亩”（《春秋·宣公十五年》），楚国的“量入修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秦国的“初租禾”（《史记·六国年表》），都说明了这种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其中前 594 年（鲁宣公十五年）鲁国的“初税亩”最为典型，它打破了“公田”

与“私田”的界限，公私土地一律实行收税制度，所以现在一般都把它看作为我国封建地主经济的开端。

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关系的变革，在各诸侯国之间是不平衡的。这样，春秋时代就出现了一些实力较强的诸侯国争霸中原的局面，也出现了卿大夫强大专权的情况。东周王室徒有虚名，反受制于“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的霸主（《战国策·秦策一》）。原来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为“自诸侯出”（如五霸）、“自大夫出”（如鲁三桓、晋六卿、齐田氏），甚至“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私有制所产生的利欲和权势欲，使得弑君弑父之事不断发生，哪里还顾得上什么血统和名分？争权夺利的斗争使维护封建领主制的宗法等级制度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而趋于衰微。“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从鲁国的“三分公室”开始（《左传·昭公五年》），韩、赵、魏“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和兼并战争，形成了战国七雄割据的局面。

战国时期，封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加强了各诸侯国的经济实力。由于各国力量的不平衡，于是出现了诸侯国之间更为激烈的兼并战争。诸侯们互争霸主，互相侵夺，弱肉强食成了国际公则。

这时期的政治状况，刘向概括得很好，其言曰：“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兵为强。是以转相放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溘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尽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政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谋之强，负阻而恃固，连

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刘向《校战国策书录》）

为了在兼并战争中取得胜利，各国都必须加强自己的实力，走富国强兵的道路；而要达到这种目的，各国的君主单靠那些宗族大臣已经不能自振了，于是又开求士之风。游士们就在这种形势下接踵争跃，谋取高位。像齐国在稷下豢养学士“数百千人”，其中地位高的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其他如大贵族孟尝君、信陵君、春申君、平原君等，也都养士数千人。这样，周代的贵族政治便逐渐瓦解，一些平民身份的人逐渐登上了政治舞台。

社会现实政治的变化，会引起人们道德观念和政治思想的转变。

刘向对此也有精辟之论，其言曰：“周室自文、武始兴，崇道德，隆礼义，设辟雍泮宫庠序者之教，陈礼乐弦歌移风之化，叙人伦，正夫妇，天下莫不晓然，论孝悌之义、惇笃之行，故仁义之道满乎天下，卒致之刑错四十余年。远方慕义，莫不宾服，雅颂歌咏，恩德其上。及康、昭之后，虽有衰德，其纲纪尚明。及春秋时，已四五百载矣，然其余业遗烈，流而未灭。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后，时君虽无德，人臣辅其君者，若郑之子产、晋之叔向、齐之晏婴，挟君辅政，以并立于中国，犹以义相支持，歌诗以相感，聘觐以相交，期会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犹有所行；会享之国，犹有所耻。小国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周之流化，岂不大哉！及春秋之后，众贤辅国者既没，而礼义衰矣。孔子虽论《诗》、《书》，定《礼》、《乐》，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无势，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时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兴。故曰：‘非威不立，非势不行。’”（刘向《校战国策书录》）

在春秋时期，虽然是各国“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政

由方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但往往还要打出礼义的招牌来遮人耳目，各个诸侯国在表面上还是装得尊礼重信，朝宗周天子，严祭祀，重聘享，强者还得“挟王室之义”作为扩张的借口（《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弱国也用这些封建道德作为抵御侵略的掩护。

从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则礼崩乐坏，以往的封建道德准则被破坏无遗，无论是国内还是国与国之间，完全为赤裸裸的唯利是图的强权政治所主宰。韩非举过一个例子，很能说明这种状况。春秋末，齐国将攻鲁国，鲁国派孔子的高足子贡去劝阻，齐国人直言不讳地说：“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于是举兵伐鲁，攻占了鲁国的土地。（《韩非子·五蠹》）

在这个时期，仁义亡而权谋起，“矫称蜂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史记·六国年表序》）。当然，权谋的使用在于求利，上至天子王侯，下至走卒百姓，莫不唯利是图。孟子所反对的“上下交征利”（《孟子·梁惠王上》），其实才真正是这一时代的风尚。

社会的变革，政治道德观念的转化，必然要反映到思想领域中。

社会上各个阶级、阶层以及社会集团，都针对当时社会变革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当然，各个阶级、阶层以及社会集团的最好的代言人便是他们中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那时属于“士”，他们在西周时地位并不高。春秋，特别是战国时期，诸侯割据，他们便各自投其所好，依附于一定的政治力量，成为这个时期各种政治力量的代言人。其中有些杰出的代表，在思想言论上建立了自己的学派，以宣传一定的哲学思想与政治主张，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学术往往为政治状况所决定，所以，这种诸子争鸣的思想斗争，

不过是诸侯割据的政治现实在思想战线上的反映。

从前，在西周的封建领主制的统治下，“学在王官”，学术为封建贵族所专有，也就只有大一统的维护封建宗法制的周礼。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大乱，才导致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所载孔子语）的状况。这种政治上的不统一，使各个学派获得了极度自由的发展。正如班固所说的那样，诸子“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汉书·艺文志》）。

由此可见，诸子的学说实际上都不过是一定的社会政治力量的政治要求与愿望在学术思想上的反映。这些理论家们都千方百计地去迎合当时的统治者，以期用他们的社会政治理论来补救时弊，改造当时的社会，也就是所谓的“思以其道易天下”（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中》）。当时影响最大的学派当推儒、墨、道、法四家。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丘。孔丘死后，韩非说它分成了八派（《韩非子·显学》），但最有影响的是孔丘和孟轲的学说。他们针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状，主张“正名”，希望恢复周代的礼制，提倡仁政，想用伦理道德和礼乐制度来端正人心，以恢复安定的社会秩序。这在“以攻伐为贤”的时代，当然会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是没有人听信的。所以，孔、孟两人虽都周游列国，但都不能得志。

墨家的创始人是墨翟。墨翟死后，墨家分成了三派（《韩非子·显学》）。他们提倡兼爱、非攻、尚贤、节用、节葬、非乐，又大讲“天志”、“鬼神”，想借用天神和鬼怪的力量来威胁“王公大人”，用自己的身体力行来感化统治者，从而消灭残酷的战争，恢复安定的生活。但他们的“兼爱”、“非攻”等主张，不论是没落的贵族，还是新生的官僚，都不可能接受，因为那实在离现实太远了；而且，中国的宗教信仰

本来就薄弱，“王公大人”绝不会听了他们关于鬼神的说教就大发善心，立地成佛。因此，他们的学说也行不通，秦汉以后，甚至成了绝学。

道家，据《庄子·天下篇》所说，分为四派，即宋钘、尹文，彭蒙、田骈、慎到，老聃，庄周。影响最大的当然是老、庄。他们厌恶现实，却不敢面向未来，而主张回到“小国寡民”、淳朴未散的原始时代。对于纷杂的社会问题，主张“绝圣弃智”，无为放任。他们以为，只要大家都无为、不争，那么社会自然会安定。他们是想借助原始时代的风俗习惯来解决社会问题。其实，在那个利欲熏心、互相征伐的时代，风俗习惯的力量如何能制止社会的纷乱呢？

对于社会秩序的控制最为得力、对于国家实力的增强最有成效的要算是法家。在风俗习惯、“德治”“礼治”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只能代之以“法治”，法家便应顺着社会的实际需要而产生了。法家的创始人可以上溯到管仲、赵宣子、子产、李悝等，真正的奠基人则应该推商鞅，而韩非则集法家之大成。

管仲在齐国推行“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史记·管晏列传》）的政策，已具有法治思想的端绪。

前621年，晋国赵宣子为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左传·文公六年》），可以说是法治的滥觞。

前536年，子产在郑国铸刑书，叔向曾写信反对他，说铸了刑书之后，“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这说明法治思想在开始的发展是很艰难的。当然，子产并不妥协，因为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救世”（《左传·昭公六年》）。的确，事实并不是作了刑书才有争夺，而是礼治已经失去了统治力，社会上的争夺必须用法令才能加以防范和制止。叔向的说法完全是倒因为果了，子